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散文卷

作家写作家(C卷)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作家写作家(C卷)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我所认识的巴金老人 | (1) |
| 提笔成章 | (26) |
| 注一个“淡”字 | (38) |
| 书为友，案为邻 | (57) |
| 我和苏策 | (67) |
| 夕阳风采 | (74) |
| 铁凝的故事 | (96) |
| 路上的爱 | (104) |
| 我说郭风 | (120) |
| 冯至先生 | (135) |
| 伴随着时代的行吟 | (143) |
| 追昔抚今话周涛 | (164) |
| 难忘的教诲 | (185) |
| 超越苦难 | (194) |
| 关于诗人孙静轩的蒙太奇 | (206) |
| 长忆白素菊 | (223) |
| 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| (235) |



作家写作家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沈从文组曲 | (247) |
| 泪洒柯克亚 | (259) |
| 缅怀秦牧老师 | (273) |
| 布衣林希 | (280) |
| 一颗真诚而炽热的心 | (301) |
| 卢跃刚速写 | (308) |



我所认识的巴金老人

荒 煤

—

在上海短暂停留的几天里，我几乎已经成为习惯，只要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呆一会，我就一定要打开窗子向浦东眺望，希望再次看到浦东大桥那高耸入云的巍峨身影。

这次到上海的日程较紧，已经预定了9日返京的机票，11月7日从广州到上海的当天下午，我就去参观了浦东大桥的建筑工地。

人的感觉往往是难以说明白的，当汽车穿过隧道驰向浦东的时候，我突然产生一种飘浮上升的感觉。我不禁想到，我这个生长在上海，曾在这里度过难忘的、贫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没有想到在青年时代又重返上海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。现在，我这个飘荡在“长江上”，



作家写作家

唱了不少“忧郁的歌”的年近八旬的老人，终于在江底穿过浩浩荡荡的大江，即将看到腾空而起的浦东大桥了。

我想，这座大桥的建立，将是为一个更新的大上海起飞而展开的雄伟的翅膀。古老、拥挤、难以扩展的上海市区，一旦和浦东开发区联成一片，那时候，大上海该是什么样子呢？

我未必能看到这个开发区的建成了，然而参观了浦东大桥的建筑工地，看到那两个雄伟的钢柱竟像两座高塔似的相峙而立，我不能不感到心潮汹涌。

11月4日是星期天，头天晚上我已打电话告诉小林，约好在第二天上午去看望她父亲巴老。

这天早晨，我又站在窗前向浦东大桥眺望，因为有雾，依稀可见那钢柱高塔朦胧姿影，不觉思绪万千，感慨不已。

我想不起来，我有几年没来上海了，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没有来，也想不起来有多久没有看到巴老了。渐渐地，我和巴老相识以来半个多世纪的许多往事不断地闪现在眼前，如梦似初，萦绕心头。

我都记不起来，我是在1934年秋冬还是在1935年

《忧郁的歌》、《长江上》是我1935—1936年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两个短篇小说集。



春认识巴老的。

当然在认识以前，我已经读过他不少的作品，知道他是位“大作家”，而且真没有想到，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，我第一次以荒煤这个笔名发表短篇小说之后，从此我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——也和巴老有关。

我爱好文学，从1932年起就开始动笔搞创作和评论。但第一次提笔写小说，却是1934年春天，写了一篇《灾难中的人群》。说实话，当时写小说，主要是爱好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为了要想拿点稿费维持生活。这篇作品听取了丽尼的意见作了些修改，他也动手作了些修改，然后就由他寄给巴金了。当时，我只想，随便找个刊物发表就行了，听丽尼说寄给巴金，我不免想到，我这个无名之辈的作品，巴金这样一位大作家他会看么？……没有想到，巴金看后又交给靳以，决定在《文学季刊》第三期发表了。

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。小说寄出的时候，我用的是我的学名，有名有姓。不料武汉反帝大同盟遭到破坏，一位领导人被捕，又发现我、吕骥、张庚我们三个人的通讯处。同一天，我们三个人的转信的学校都有人去查问我们的住处（我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），就连夜转移，各奔东西，一时漂泊不定。

丽尼知道这个情况，听说小说决定要发表，当然不



作家写作家

能用我的原名了，却又一时记不起我过去的其他笔名，许是荒煤这个笔名有点怪，他记住了，就写信给靳以，改用荒煤这个笔名。

接着靳以又给丽尼来信，约我再给《水星》写篇小说，我就又写了一篇《刘麻木》。当然也是用了荒煤这个笔名。

从此，这个笔名也就奠定终身了——更有趣的是，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我原定去鄂豫皖边区工作。我正式打报告给中央组织部，要求改名，废除荒煤这个笔名，因为我希望长期到地方基层工作，加强锻炼，不再搞文化工作，结果没有被批准。

二

我已经记不起来，是1935年在什么地方和时候认识巴老的。现在已经55个年头了。

中国有句老话：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大概也可以概括巴老和我之间的友情。认识的时间很长，却并没有频繁的接触，还有两次较长的分离。1937年6月我到北平去，原想到绥远抗日前线去采访，后又决定去延安采访，不料因芦沟桥事变而陷于北平，后来随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从北平逃出，流亡至山东、徐州一带，于1938年后经武汉去延安，直到全国解放后，在1950年春因



公赴沪，整整阔别 14 年，我才再次见到巴老。

第二次久别是从 1964 年文化部整风之后。1964 年前，我几乎每年要到上海电影局、制片厂看影片，谈计划的，还能经常看到巴老。从 1964 年之后，经过“文革”，我被反复批斗了两年多，在监狱里关了七年，后来又被送回重庆市图书馆书库里清理旧书，写了三年卡片，直到 1979 年夏天，我到上海再次见到巴老，却又整整 15 个年头了。我年过花甲，巴老也已经是年逾古稀 75 岁的老人了。

我只记得那天上午，由文学研究所严平同志陪着我乘电车下来，走了许久，才找到巴老家门口，但我觉得心情激动，都无法举起胳膊来按电铃了……一下子看到巴老，我都说不出话来。我看到巴老显然苍老的面容，就立即想到张春桥那句杀气腾腾的话：

“巴金，不枪毙他，就是宽大！”

这个情景，至今想到也觉得哭笑不得！

历史是无情的，却也宽容。这个该枪毙的张春桥还在监狱里。他这个三十年代混在上海滩上的一个小小无赖文人，对手无寸铁的从事革命、进步文化活动的文化界人士，都恨不得一网打尽，置于死地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这段历史真的都澄清了么？

我还想起来，1958 年夏天，我到上海去就听说了：



作家写作家

“柯庆施曾经讲过，思想解放，就要敢于批权威，上海就要动动巴金。”也可见是早有此心了。

巴金究竟有什么值得枪毙的“罪行”？！

.....

我和巴老的确接触不多，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也很难一一回忆起来，但我至今还有些片断零星的印象，是无法忘却的。

我 1935 年认识了巴金，那时我才 22 岁，心目中，总觉得巴金是一个当代大作家，已有很多作品与译作出版，而我才刚刚开始创作，是一个小青年，所以即使见面，加上我的个性也不大爱讲话，不免有些拘束，所以交谈不多。

可是一件小事，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印象。大概是 1936 年春天，我住在丽尼家里，后门就对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大门。有一天中午，我和丽尼的夫人许严在后门自来水过道里的炉边做饭，我正在炒菜，红烧豆腐。巴金和丽尼从出版社出来了，大概是有什么活动，巴金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刚要走，丽尼忽然叫住他，指着笑道：“荒煤的拿手菜，味道蛮不错，你来尝尝！”我很不好意思，可是看到巴金笑嘻嘻走过来，说我尝尝，于是丽尼用一个小盘子装了两三块豆腐递给了巴金，巴金就站在后门口，穿着整齐的西装端着盘子吃完了豆



腐，还连声说：“不错，味道蛮好！”……

丽尼还说，哪一天让巴老来专门吃一次许严和我做的湖北菜……巴金说一定来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我也不记得是否请巴金吃了一顿湖北菜。但这一次，却使我心里产生一个可笑的想法，这个大作家还很随便，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严肃，难以接近。

之后，更深刻的一个印象，是巴老对鲁迅的尊重。

我只见过鲁迅两次。一次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宴请鲁迅的宴会上，一次是在《作家》创刊后的一次宴会上。巴老总是紧紧挨近坐在鲁迅身边，很高兴、很热情地向鲁迅介绍会见的作家，鲁迅也总是随时站起身来亲切地和每一个青年作家握手。而我每次和鲁迅握手后都感到有些抱歉，因为兴奋和激动，我的手心总是泛起一阵冷汗。手特别凉。我看到巴老在鲁迅身边坐着，始终用一种充满着尊敬、坦诚、真挚的眼光注视着鲁迅，有时候看到鲁迅要站起身来与人握手时，不自觉地就伸手扶一下，始终认真地聆听鲁迅的谈话。总之，是一种无法形容却能直接感受到的真诚的、由衷的关怀和敬重的心情。

尤其是鲁迅逝世后，我亲眼看到巴老抬着鲁迅的灵棺走到墓地那种悲痛、深沉含泪的神情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。



作家写作家

还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忘却的，也从来没有讲过的。

在1936年两个口号的争论展开之后，有一次我遇到巴金和靳以，我们谈了一次话。当时，我参加了《文学界》的编委工作。

巴老首先说明，他们不了解这个争论的真相，说不清楚，不参预。但是，他们尊重“周先生”（指鲁迅），相信周先生，希望不再扩大这个争论了。靳以历来为人很坦率：就直接提出来希望我不要参加。甚至最后还明确告我：如果我生活上有困难，《文季月刊》可以多发表一些我的作品。

我当时实在无法说明这个问题，也弄不清楚这两个口号的论争的实质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就没有参加当时的领导工作，许多情况弄不清楚，反正觉得是党提出来的，就去做。我感到为难的是不能告诉巴老和靳以，我是由组织上决定和沙汀、舒群、徐懋庸、黄洛峰一起参加《文学界》编委会的。

我只写过一篇文章：《国防文学是不是创作口号》，也只是根据我个人当时的理解和认识而写的，并没有想参加什么争论。

另外，我有一个简朴的观点，民族危机的时刻，大家都应该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战争，对主张抗日的活动都应积极加以支持。



所以，我热情地去参加了 1936 年 6 月 7 日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成立大会。同时，又感到有些奇怪，为什么鲁迅和另一些作家没有参加。但是，在这之前黄源同志有一天到丽尼家来找我们，拿出一张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》给我们看，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签名。我至今也还清楚地记得，我看了之后立即回答：“为什么不参加，当然应该签名！”并立即签了名。黄源还高高兴兴地谈了一阵才离开。这就是 1936 年 6 月 15 日在《作家》一卷三期发表的以鲁迅、巴金为首的 63 个作家发表的宣言。

我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很快给我来了一封信，还责备我为什么在两个宣言上都签了名。

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徐懋庸个人竟然给鲁迅写了那样一封信，在论争中掀起了一场风暴。事后，我曾当面批评过徐懋庸，也竭力劝他不要再发表给鲁迅的回信，但他不听。我当时也不同意徐懋庸对巴金、黄源、胡风的评论。而且，在我和巴金、靳以谈话之后，我却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鲁迅怀着一种真挚的敬重之情！
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：事隔 40 多年，我在 1975 年 5 月被释放出狱的时候，在我的结论中还列有这样一条罪行：

“鼓吹‘国防文学’，对抗鲁迅”。



作家写作家

而始终尊重鲁迅的巴老，紧伴着鲁迅为开拓新文学运动作出重大贡献的巴老，竟也受到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。

更可悲的是，凡是参加论争的两方作者，也都遭到“四人帮”的迫害，似乎无一幸免。

三

尽管我到延安之后，主要是做教育、行政工作，创作不多，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，我几乎完全放弃了创作。但在建国之后，我还是受到巴老不断的鼓励，希望我还是要搞点创作，也的确使我曾经不止一次想重新提起笔来进行创作。

1950年夏天，解放后我第一次因公出差到上海，我就去看望了巴老。有一天，巴老和靳以请我在“红房子”餐厅吃西餐。相隔14年又重逢在上海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不料靳以突然问道：

“荒煤，你现在还想不想写小说？”

巴老没有说什么，但是微笑地注视着我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愣了一下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嘟哝了一句：“我——我还是想写一点试试。”

不多久，我在武汉就接到巴老寄来的一大包书。其中都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作，如鲁迅译的《死魂灵》，



巴金、丽尼翻译的屠格涅夫的《猎人日记》、《前夜》、《贵族之家》等。打开扉页，上面确有我当时的签名，是一个“梅”字。我也不知道巴老怎么知道这是我的书。

巴老在信上说，他在清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存档中发现了这批书，想我还是会很喜欢它们的，特地寄还给我。另外，他还发现有些我的手稿，觉得应该保存，就直接寄到北京图书馆去了。最后说，他能想象，我的工作很忙，但希望我还能抽空写点小说。

我这天晚上反复翻阅这些书籍和巴老的来信，为巴老这种真诚的关怀所感动，不免浮想联翩，真地动了心，想到应该写一个长篇小说：写一群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成长起来的青少年，经过各自不同艰辛悲惨的遭遇，而终于在全国解放之后在武汉重逢的故事。

1956年我和何其芳同住在北京医院的时候，两个人都还天真地谈到各自的创作设想。其芳还直夸这个题材好，连声点头笑道：

“写嘛，写嘛！”……可是，我也还是一直忙于行政组织工作，无法动手。这些书和我保存的巴老的信，在“文革”期间都消失了。然而，这个“小说梦”却还在。

——1975年夏，我出狱之后回到重庆，在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里工作，整天清理旧书报刊，写



作家写作家

卡片。

大约是 1976 年春天，我突然发现一堆旧书刊里有几本三十年代的文学杂志。我看到了我的几篇小说。尽管我也想到，我出狱时曾宣誓般做过保证，绝对服从任何工作的分配，保证做好本职工作，但觉白天的工作实在不需要动什么脑筋，可否在晚间动手写点小说，把 1956 年和其芳谈的那个设想写出来？一下子，犹如被一场噩梦纠缠住了，我随时陷入如梦似幻的一些想象中，苦思冥想，焦灼不安，经常失眠，十分苦恼。

我终于抑制不住，和一位还能谈点想法的同志透露了这点信息：我不知我是否可以还写点东西。

这位同志认真思索了一下，然后慎重地提醒我：

“会不会有人会这样想：你还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……还想死灰复燃？”……

我猛然想到，我的结论中还有这样一条严重罪行：“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”——这条罪行早已经宣判了我文学生涯的死刑。这时候，我才清醒过来，我不禁狠狠把自己谴责了一通：想得太天真了，真是本性难移！

“小说梦”彻底破灭了。我像突然掉在一个很深的冰窟里，全身心都冰冷了，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痛苦。我这时候才真正懂得了一个人到了“万念俱消”的



境地是什么滋味。我也觉得我突然老了十年，只能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。

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1978年春天，我又终于回到北京，又回到文学工作方面来，还在工作之余写了点散文，又得到巴老的鼓励。

例如1982年6月，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祝贺巴老获得意大利但丁奖的文章：《心灵中仍燃烧着希望之火》，寄给了巴老，很快就接到巴老在病院里给我的回信：

荒煤同志：

信悉。我的病已全愈，但写字仍感困难。文章已拜读，觉得你把我写得比实际好了些，高了些。不过对你的好意我感激。你支持我讲真话，我高兴。写字吃力，许多话见面再畅谈吧，另封寄上《近作三》一册。祝好！

巴金

我为巴老谦虚的精神所感动，这更加激发了我，即使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还将用在行政组织工作方面，我还是尽量抽点时间写点散文，觉得也是对巴老期望的一个回答。